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長篇書評〉

	芭特勒的戰後之事：脆弱的存在論與危殆的生命	蕭育和	1

〈短篇書評〉

Howard Caygill	*On Resistance: A Philosophy of Defiance*	周時晴	7
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張啟謙	11
Bruno Bosteels	*Badiou and Politics*	許子文	15
David Vine	*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黎野平	19
Ho-fung Hung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謝陶陽	23
Carlo Galli	*Janus's Gaze: Essays on Carl Schmitt*	魏柏高	27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一七年六月　第五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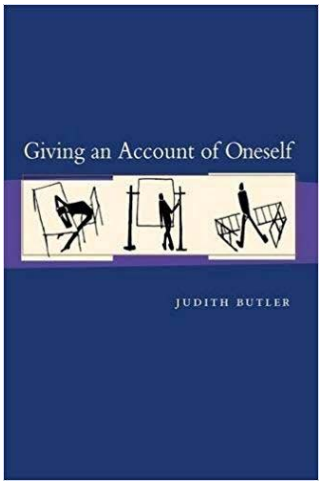
編輯顧問　徐斯勤、石之瑜
主　　編　蕭育和
執行編輯　鄭皓中、陳明宗
編輯委員　江俊宜、江俊儒、李天申、陳亮宇、楊尚儒、廖斌州、蘇慶軒

發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地址：10617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02）3366-8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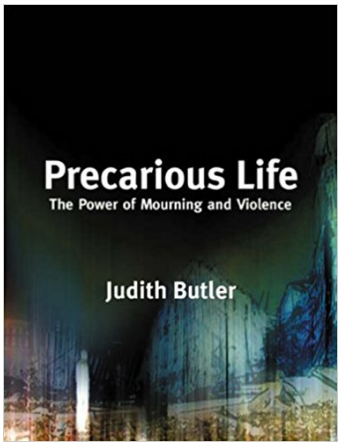
10.6570/PSQBR.2017.54.1

芭特勒的戰後之事：脆弱的存在論與危殆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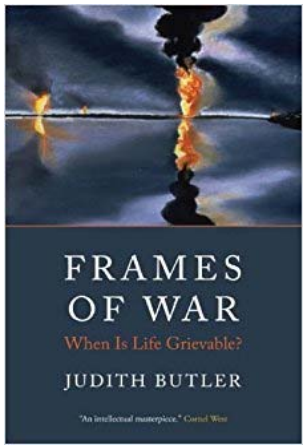
蕭育和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書名：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
作者：Judith Butler
出版者：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年份：2005
頁數：160 pages
ISBN：978-0823225040



書名：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作者：Judith Butler
出版者：Verso
年份：2006
頁數：168 pages
ISBN：978-1844675449



書名：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作者：Judith Butler
出版者：Verso
年份：2010
頁數：224 pages
ISBN：978-1844676262

每一場戰爭都有戰後之事（Every war has its after-war）。可以說，911 事件是芭特勒（Judith Butler）思想的新起點，2004 年出版的《危殆的生命》（Precarious Life）（以下簡稱 PL）與 2009 年出版的《戰爭的框架：生命何時能被哀傷》（以下簡稱 FW）（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兩本著作，所反思的主題都是「戰後之事」：媒體如何講述戰爭、如何有所分別地打造傷害的形象、新的主權機器如何處置戰後之事：諸如無限期羈押與虐囚等等。如她在後者的前言中所說，這兩本書的共同思路是「如果人們不首先把某些生命理解成生命，那麼，這些生命所受到的傷害乃至於逝去，也就無法得到理解。如果某些生命無法具備生命的資格，如果人們依開始就沒有將其視為符合特定認知框架的生命，那麼這些生命就從未真正存在或逝去」（FW: 1），總之，理解生命的框架式什麼？

這樣的反思，與美國知識界與輿論界對 911 事件的反應有密切關係，芭特勒無法迴避這些反應的「提問」（address）──這是她反思戰後之事的倫理立場，容後表述──一方是舉著「義戰」大旗揚言重建世界秩序的新保守派，另一方是浮誇指控美國帝國主義才是傷亡元凶的「左派」，對傷亡的悲痛（grief），除了訴諸以暴易暴，以及無能逃出仇恨迴圈的兩種主流姿態之外，恐怕還需要新的倫理立場與視角，來面對戰後之事的提問。

通過對戰後之事的反思，芭特勒表述了脆弱（vulnerability）的倫理與政治意義，在 2005 年出版的《一個人的自陳》（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中，對於這個主題有更理論性的反思。在這本著作中，芭特勒認為，主體的存在本身是蒙昧不清的，而這樣的蒙昧不清，來自於他者的脆弱，為他者的提問（address）困擾著主體。戰爭為戰後之事，為「傷害」（injury）向我們提問，迫使我們反思生命的危殆與表述生命的框架，進而認知到我們在肉身上的相互依存，我們的生存，或說倖存（survival），端賴於他者，「我們的生命依賴於他人，依賴於那些從未謀面，終其一生都不會認識的陌生人。這種依賴陌生人的根本處境不會因我的意志而改變。任何安全舉措都無法消除這種依賴，任何以主權之名進行的暴力，都無法讓世界擺脫這個事實」（PL: xii）。

「普遍的脆弱」不是對於人的本質的假設性表述，它不是「人與人相互為敵」那種普遍脆弱的悲慘情境，某種意義上，它是一個弔詭的說法，因為，脆弱本身是一個高度選擇性的後果，用巴特勒自己的話來說，它是一個「被框架後」的結果，有些生命是脆弱的，陷於危殆當中，成為可被哀傷的生命，而有些生命是邪惡與罪有應得，有些生命的逝去不值得哀悼。當我們說一個生命是脆弱的時候，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得到了「承認」（recognition），「脆弱得要被認知與承認，才能在倫理的遭遇中發生作用」（PL: 43）。

因此，強調肉身之間相互依存，從而有其本質上脆弱性的存在論立場，並不是單純是一種相互承認脆弱，進而推導出具有共識正當性的規範性前

提，相反，肉身脆弱的存在論與規範之間，是一個相互界定，彼此又無法完全涵括的張力關係。脆弱免不了依賴於框現其存在的規範網絡，肉身及其脆弱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自然之物，它受制於他人與規範，受制於整個由歷史發展過程造就的社會政治組織，在這些「最大化某些人的危殆，又最小化其他人的危殆」（FW: 2-3）的規範性框架中，肉身從來都不是等價的：戰死的士兵可以被哀悼，自殺的弟兄不能被紀念；死於雙子星大樓的平民，其經歷會反覆在各種儀式與文本被講述，而死於無人機轟炸的穆斯林，因愛滋病席捲而死的非洲人民就只是一串數字。

「承認」是理解的框架，它是雙面刃，我們一方面為其所承認的關係建構，但也隨時可能被這關係框架所褫奪（dispossess），框架的運作，無可避免取決於對「無法理解物事」（the unintelligible）的排除，「受壓迫意味著已然作為某種主體而存在，在這裡有一個可見且受壓迫的他者…受壓迫首先要是『可理解的』（intelligible），發現自己是全然無法被理解的…就無從接近，無從發現你的言說…」（PL: 30），承認與脆弱是共生而成：

假如脆弱是人性化的一個前提，而人性化通過承認的變動性規範而狀況不一地出現，那麼就可以推論出，假如脆弱要被賦予任何的人性主體，它根本地賴於承認的既有規範（PL: 43）。

作為規範框架後的效應，生命脆弱與危殆就其本身不是普遍的，其「普遍性」來自於它被「匿跡」起來，被程度不一，差別不一地看待，但是「框架永遠不可能完全掌控自身試圖框定的事物。總有框架無法框定的事物，它們位於框架之外，正是它們使框架之內的事物擁有得到識別，得到承認的可能」（FW: 9）。被匿跡起來的生命是「幽靈般的生命」，它「標誌了生命標準的邊界，困擾每一種符合規範的生命」，規範的擴大與含括無法消除這樣的幽靈，「生命的建構性生產並不會完全實現，存在論意義上懸而未決的幽靈存在始終會困擾這種生產」（FW: 7）。

芭特勒強調，儘管「對危殆的理解應該成為承認規範的基礎」，但同時「危殆不可能完全得到承認」，重點是，不應該讓危殆成了「承認的作用或結果」（FW: 13）。承認所預設的溝通倫理立場，預設了一切的傷痛都可以被等量齊觀，但著實不是，提出脆弱的存在論，目的「不在於將更多人包含在既有規範內，而是反思為何現有規範會如此不公地分配承認資格。能否提出新規範？如何提出新規範？」（FW: 6），它所回應的是無以名狀的傷痛，無法被承認的危殆。脆弱存在論對肉身相互依存的強調，主要並不是為了推導出相互承認的規範，其作用是質疑界定危殆，排除不值得悲痛生命的規範框架。

將生命有所差別地「框現」，並不等量地呈現其危殆與脆弱，不僅僅只是紙上談兵的批判，戰後之事延伸出新的治理型態，運用傅柯（Michael Foucault）對於主權與治理性的區分，芭特勒認為，當前以戰後之事為名的政治治理，是主權藉由治理性機制捲

土重來的過程。它以「安全警戒與緊急狀態」為名，採取各種將例外狀態常態化的手段，成為「國家主權的新模式」（PL: 51），在戰後之事的新世界中，我們既非公民，也非戰士，而全是潛在的危殆生命，其典型是關塔那摩灣羈押營中被關押的囚犯，他們的生命脆弱，但不被承認，身為人而不具有公民權利，是〈日內瓦公約〉所保障的塔利班成員，但不被認定是「戰俘」(「沒有戰爭」)，所以其羈押不受公約約束。「無限期羈押」是戰後之事新「法」（nomos）：法律與法治（rule of law）退位，「法律自身的司法權限被限制與懸置」，而主權在治理性的純粹方法與戰術場域中，捲土重來，它「不再是一種在正當性前提下的一致化權力，以及保證政治體制代表性地位的權力形式，而是一種無法的特權權力，名副其實的流氓權力」（PL: 56）。

從無限期羈押到倫理反思，如果不是單純出於傷感緣故，箇中的延伸或許並不是那麼一目了然。但其實兩者之間有一個共通架構，無限期羈押能得以實施來自於國家至高無上的主權遭受攻擊這個事實，因此非常手段是必要的，儘管它得「暫時性」懸置我們所信仰的法治，這個說法背後預設的是主權看似不可挑戰的自我證成，這不可挑戰的自我證成，一方面為其差別性地對待生命，剝奪公民身份以遂行無限期羈押，匿跡其他生命的脆弱危殆提供理據，另一方面，又隱含了主權自身「易受攻擊」的脆弱危殆。芭特勒的戰後之事反思，所要徹底挑戰的，就是這樣的論述理路。

我們對道德與倫理的反思，不應該來自於主體自身的自主性，某種意義上，高舉主權自主性的全球正義聖戰，證明了這樣的「倫理立場」，其實帶來更大的傷亡，強化了仇恨的循環，反之，道德與倫理意識與反思，來自於他者的提問籲求，此即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臉孔（face）概念。芭特勒對臉孔概念有極具洞見的解讀，臉孔傳達了「汝勿殺」的戒律，但弔詭地是，它也同時是一個殺戮的誘惑，但它一方面是他者脆弱性的籲求，另一方面，這樣的脆弱也引致了殺戮的誘惑，芭特勒認為這樣的說法很妥切地表述了生命的危殆，臉孔概念所表述的「倫理的焦慮」（ethical anxiety），同時是誘惑與誡命之間的對立與衝突（PL: 132）。

臉孔是一種存在關係的表述，它表述了一種被匿跡之物，芭特勒見解獨到之處在於，被匿跡之物無法如實地出現，它存在，但無法被「框架」表述。臉孔只是一個意象式的說法，它說明有某種東西存在，但無法得到承認，芭特勒用勒維納斯在〈和平與切近〉（peace and proximity）一文中對 Vassili Grossman 的小說《生存與命運》的援引，來說明這個臉孔這個概念，小說裡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政治犯的家屬…趕赴莫斯科盧布揚卡監獄，要了解家人近況。接待台前排了長長的隊伍，排隊的人只能看到其他人的背脊。一個婦女在其中焦急等待，她從沒想過背脊可以如此意味深長，可以這樣深刻地傳達人的心境。接待台前的人翹首盼望的姿態十分特別，此起彼伏的肩膀像是汩汩湧出的泉水：似乎在哭，在

低聲啜泣，在嚎啕痛哭（PL: 133）。

芭特勒認為，臉孔所表述的，並不是誡命本身，甚至不是他者的脆弱本身，如同上述，不管是誡命或脆弱，都意味著其能在規範框架中有一個位置，但是，臉孔所表述的是卻是無法表述的痛苦，它可以是一連串的形象換位（displacement）：背脊或淚水，但是這個換位，其「序列結尾卻是一個無以名狀的發聲（utterance）」，無法用言語傳達，「難以言喻的痛苦標示了語言轉譯的界限」，無法用言語表述，意味著臉孔是「讓一切言語都束手無策的東西」，「，臉孔似乎是一種聲音，一種剝離語義後的語音」（PL: 133-34），在這個意義上，臉孔才成了他者極度的危殆，並提出籲求，要求回應，勒維納斯式的和平，是對他者之危殆的醒覺（awakedness）：

對臉孔的回應並理解其意涵，意味著對他人生命之危殆的覺醒，或者，對生命危殆性的覺醒。用勒維納斯的話來說，這不能是自身生命的覺醒，繼而推己及人，由對自身危殆性的醒覺，去理解它者的危殆生命，這種醒覺應該要是對他者危殆性的理解。因此，臉孔就有了倫理的意義…（PL: 134）。

借用勒維納斯，芭特勒構思了一種不立基於人類學假設的倫理學可能，正如前面所強調，脆弱並不是一種本質性預設，它是一種與他者之間無以名狀的關係，這樣的關係「建立在我原初，且不可逆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GA: 88），人並非因為與他者的關係，而具有主體性，相反，人的主體性來自於擔負責任，而責任的擔負則意味著我為他者，為臉的籲求與提問所束縛，被逼迫回應。生命有其無法選擇（unchosen）的面向，在這個被臉與他者所束縛，重新反思危殆與脆弱的關係中，不僅僅只是我這個自我以及所謂的「自由」，而是界定我的自由與他者之危殆的框架，與他者的共存與切近（proximity）於他者，唯有如此，脆弱存在論才能讓被匿跡者，不再需要藉由框架與規範現身：

對暴力的批判必須從生命的表徵問題入手：在什麼情況下，人們會把生命理解並描述成危殆並需要庇護的對象？又是什麼妨礙了人們如是理解生命？……對生命的感知不等於遭遇作為危殆的生命，這樣的遭遇並不是排除一切干擾的袒裎相見，彷彿生命可以剝離一切尋常的意義，擺脫所有的權力關係，現身在我們面前。慣常的理解框架被打破以後，並不會自發地出現合乎倫理的態度，日常認知的禁錮被解除之後，也不會立刻催生出純粹道德的良知。反之，只有批判與挑戰主流媒體的認知框架，某些人群才能進入眾人的視線，其生命的危殆才能為人所知。跟生命相關的視覺衝擊不是理解生命之危殆的充要條件…（FW: 51）

10.6570/PSQBR.2017.54.2

On Resistance: A Philosophy of Defiance

Howard Caygi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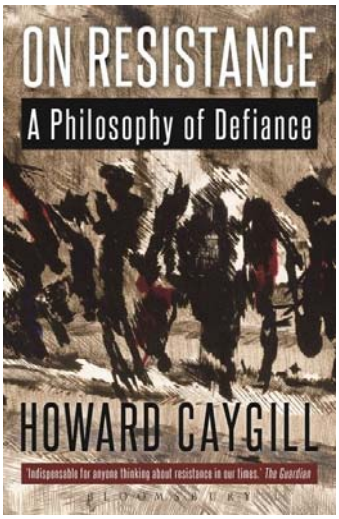
周時晴 /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我們生於一個「反叛」的年代，歐洲的阿拉伯之春、希臘反撙節運動以及法國的黑夜挺立，在亞洲，香港的雨傘運動與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無不對偽裝成民主，操持廉價政治語彙的代議政治，給予迎頭痛擊。

而凱基爾（Howard Caygill）最近出版的這本《論抵抗：一種反叛的哲學》（*On Resistance: A Philosophy of Defiance*）可謂恭逢其時。凱基爾在這本書中討論的是「反抗」的理念與具體經驗，這個概念在當代社會政治哲學中「非常詭異地沒有被全面分析」。不過，對凱基爾來說，抵抗必須被視為「目的本身」，而有別於達成任何政治目的的工具，這意味著要抵抗概念化的任何嘗試，正如他所說，「抵抗的哲學」必須「抵抗概念化的壓力」。

因此，克勞塞維茨的思想成為凱基爾的起點，就不讓人意外，在其經典的《論戰爭》中，克勞塞維茨說所有的戰爭都是摧毀敵人抵抗的能力，並且不惜代價保留我方的抵抗能力。克勞塞維茨所說的「如雲霧般難以捉摸」，無從預測其出現的游擊隊，正是抵抗行動的本質。「戰爭是政治的延伸」這句名言，就有了新的意涵：抵抗是政治的延伸。

在凱基爾看來，克勞塞維茨的游擊隊論述，可以成為抵抗作為創造性行動的理論理據，這是一種「對機運的想像性回應」。克勞塞維茨必須被理解成一個康德主義者，一個不把機運與意外輕易化約成自由意志，從而成為歷史進步一環的「武勇」康德。對凱基爾來說，康德抵抗治理，中斷其正當性，並提供思考機運之於理性作用的反思性批判，在克勞塞維茨手中，成為抵抗行動的綱領。抵抗的核心思想並非策略算計，更非理性證成。



書名：On Resistance: A Philosophy of Defiance
作者：Howard Caygill
出版者：Bloomsbury Academic
年份：2015
頁數：264 pages
ISBN：978-1472523099

抵抗也許出自正當的抗爭，但這並意味抵抗的所有行為都是好的，除非，在抵抗的政治行動之上，有更崇高的倫理價值。凱基爾這本書中的抵抗英雄們，有因為被發現身藏凡士林而被警察譏笑，因為同性戀身份而被蔑視的尚惹內（Jean Genet），站挺反叛姿態，無畏國家暴力的粗暴對待。也有反對美國在英國部署導彈，紮營抗議十九年的格林漢康蒙和平營（Greenham Common）的女性抗議者。

抵抗的姿態是不願向宰制臣服，不向暴力的誘惑低頭。「反叛的哲學」要抵抗的不只是概念化的壓力，更要抵抗暴力的誘惑。這是凱基爾對比甘地與毛澤東的主因。對凱基爾來說，毛澤東對軍事行動與暴力的迷信，對於抵抗的實踐有毀滅性的影響。而甘地的「不合作」（satyagraha）與「非暴力」（ahimsa），則在堅定的信念中，這是一種不為外力所動搖，完全立基於其投身事業正義性，從而鞏固了抵抗的實踐行動。

因此，支撐抵抗的並不是暴力，而是一種全新的，自由生命形式的創造，如甘地所說，「假如一個人拒絕服從不義的法律，就沒有任何暴政可以奴役他」。但暴力所造成的後果就只是「升級」（escalation），因為它反面證成了對手對暴力的使用。抵抗要實現的，就是打破暴力升級的死胡同。

就如馬科斯（Marcos）──薩帕塔解放軍的副司令，一個蒙面但據說是白人教授的神秘人──在 1994 年撤退回叢林後的一個訪問所說：「我們說讓我們摧毀這個國家（state），這個國家系統；讓我們打開這個空間以及讓人們接觸這些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提出民主、自由以及正義，因為只有這些物質條件被滿足，人們才有機會加入國度（country）的政治生活」。

透過堅定的信念與非暴力的行動，抵抗讓任何企圖以軍事與暴力手段摧毀抵抗的舉措無效。抵抗在手段與目的的理性算計之外開闊出另一種知識，另一種生命樣態，一個絕對不會臣服任何個人意志的思想世界。而真正讓國家暴力畏懼的是這個無法界定，從而無從算計，更無從預測的抵抗姿態。

然而，批判暴力不等同於幼稚的拒絕死傷，「死亡」與抵抗之間有著複雜的關係。薩帕塔解放運動的道德權威，來自於他們聲稱代表的「抗暴的死者」（the resistant dead）：那些在墨西哥歷史上抗暴而死的先烈們。

對於甘地，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與薩帕塔運動的討論，在此書中有不小的份量，甘地式抵抗是一種生命的方式，它反覆肯定了反叛，但凱基爾強調，「不合作」的力量來自於「立誓求死的勇氣」，由於接受了死在對手手上的潛在可能，所以凱基爾說，所有的抵抗主體，「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死者」。於是，儘管抵抗的正面意義來自於對於抵抗意志的承認，來自於新生命樣態的開闊，但同樣的，它也要求抵抗者，願意坦然接受（潛在的）死亡。

在當代的抵抗運動中，「死亡」在

相當程度上也是佔領的隱喻，佔領藉由拒絕言說來言說，用沉默與僵持不下，持續強撐下去的行動，來進行抵抗。凱基爾強調，抵抗所造成的「僵持」（*stasis*; the state of standing）狀態正是對宰制的懸置。

義大利詩人作家與導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在他被殘忍凌辱而死之前的最後訪談──他把這個訪談題為「我們都置身危險」──中，對於他隨時都有殺身之禍的處境，他表達了即使情勢險峻，但依然不會絕望的姿態。在論及艾希曼這位當代「庸常之惡」的象徵時，他說「拒斥一直都是根本的姿態」，艾希曼的「庸常之惡」來自於他對自己的工作充滿抱怨，但又明哲保身，力求上進，對於體制的一切他不打算表現任何抵抗的能力，集中營的基進之惡正來自於他沒有「當一開始被要求做的只是官僚的行政作業時，說『不』的能力」。

對艾希曼的反思所體現的是，大屠殺的恐怖並非來自於秩序中的小奸小惡小小的缺口，而是來自於秩序紀律嚴明的運用，來自於嚴守規範，遵照指示，不願抵抗的人們。正是這種行屍走肉般的服從（*Kadavergehorsam*），揭露了現代政治的痛處：將共識與服從劃上等號，就間接證成了任何手段的「升級」使用，以及不存在更高價值的空洞。

在那本以「隱身的委員會」匿名的《將臨的起義》中，我們一開始就讀到這麼一句話：「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現狀都已沒有出路，但這還不是最糟的」，這個「未來不再有未來」，而反叛正是不與宰制妥協，不向暴力的誘惑低頭的未來。凱基爾這本謹慎，不失熱情，對於失敗主義與烏托邦都保持距離的「反叛哲學」之書，無疑是重要的思想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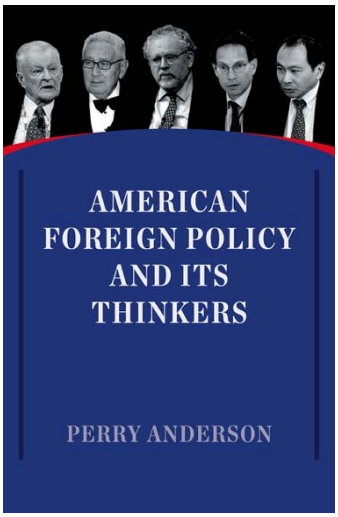
10.6570/PSQBR.2017.54.3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Perry Anderson

張啟謙 / 政治大學政治系學士

2016 年，扣人心弦的美國總統大選落幕，一個政治「素人」川普上台，川普不甚得體的形象或許不是世界對其就任總統最主要憂心，更讓全世界關注的是，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其外交戰略，是否會在這個素人（狂人）手中天翻地覆？在這個充滿疑慮的關頭，安德森（Perry Anderson）《美國外交政策及其謀士》（*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的出版，可謂躬逢其時。在這本著作中，安德森詳細闡述了美國「帝業」的思想根源，以及一連串外交戰略「謀士」令人目不暇給，對於帝業的擘劃與思想。



書名：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作者：Perry Anderson
出版者：Verso
年份：2017
頁數：288 pages
ISBN：978-1786630483

安德森首先指出，美國帝國意識形態從誕生之初，就是一個充滿張力的理念複合體，一方面，它具有「例外論」的色彩，美利堅合眾國是一個不帶有舊世界封建殘餘的新政體，透過獨立戰爭，它是新世界第一個永久享有自由憲法的共和國。與例外論調構成強烈對比是其「普遍主義」色彩，受到神恩寵的美利堅民族，對於世界秩序背負著神聖的使命。

例外論與普遍主義構成了一種不穩定的複合。前者的信念讓人相信，美國只有孤懸於墮落的世界之外，才能保存自身獨特的美德。後者又促使美國熱烈地採取救贖這個墮落世界的彌賽亞式行動。如 Anders Stephanson 所說，美國民意會在「隔離」與「重生性干預」兩極之間，民意會多次突然轉變方向。

兩次世界大戰在某種程度上為這個張力畫下句點，美國必須為戰後新世界秩序承擔更大責任，已無疑義。在上個世紀，紐約市記者歐蘇利文（John L. O'Sullivan）提出了知名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說法，主張「吾等盡取神賜之洲以納年年倍增之萬民自由發展之昭昭天命」，認為擴張自由民主政體，是美國的天命，這樣的說法為美國 19 世紀的

美洲經略，提供了思想根源。1912 年，在一次競選演講中，威爾遜提到了美國的「神授天命」，可以說為日後美國在 20 世紀的世界干預，定下了基調：

如果我不相信上帝的旨意，那我就像是被蒙住雙眼，穿行在無序的世界中。我相信上帝的旨意，我相信上帝掌控著這個民族的誕生。我相信祂賦予我們自由的目光…我們被上天選中，要向世界其他民族展現該如何在自由之路上行走…一兩代人的時間內，我們將登上最高峰，那裡將毫無阻礙地閃爍著上帝的公義之光。

由例外論所啟發的「本土傳統」，以及由普遍主義所鼓舞的「十字軍戰士」，也分別構成兩種思想風格與戰略手段殊異的謀士陣營。但新的世界，新的角色，也出現了新的張力。當美國領導「自由民主陣營」執行對赤色共產世界的圍堵時，「例外論」的思想以不同的形式，對美國的全球干預，提出了嚴厲的批判。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及所謂的威斯康辛學派）主張，冷戰的圍堵是「美式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體制」的擴張，它與美國期在北美內部的邊疆，到門戶開放政策，再到冷戰時期為取得全球支配地位的莽撞行動，一脈相承，他們認定，「整個軌跡在道德上是災難性的，背棄了由平等者組成共同體」這個美國先行者的理念。

但這樣的想法只是插曲，根本原因是，美國在全球格局的地位已經改變，而新世界對於「安全」的定義，也不再是 19 世紀所構想的那樣。對主流的自由派決策者來說，「構成美國外交政策指導原則的，應該是安全而非對利潤的追求，決定這點的是冷戰，而非門戶開放政策」，易言之，是新的冷戰格局，決定了帝業的政治議程，不管是世界干預還是門戶開放，都只是這個格局下的衍生，而非主導。

新的世界格局也鼓動了新的戰略思想，著重「現實主義」還是「經濟優先」的不同謀士，在美國帝業的成形階段眾聲喧嘩。這反映在對於新張力的反思。新世界的張力是，建立一個更安全的世界，同時意味著為資本建立自由流通的空間，以及美國在權力平衡中的優勢地位，如果兩個目標發生衝突，又該如何？這個問題在羅斯福時期並不特別緊迫，但到了尼克森主政，它立刻成了必要處理的問題。面對美國權力優先於美國利益，以及帝國國家機器的控制範圍超越本國資本的要求這兩點的壓力，尼克森選擇了妥協，他廢除了布列敦森林體系，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與自由世界的團結這些原則妨礙了美國國家利益，短期來看，貨幣貶值恢復了美國出口商的競爭力，長期來看，美元與黃金脫鉤使得美國在經濟事務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在美國帝業的歷史中，尼克森的戰略微調有相當的重要性，其重要遺產有：第一，自由貿易體制的運作不能影響美國的國家利益，雷根任內施壓讓日本與西德的貨幣升值，美國的出口業再度恢復活力。第二，在遠東地區建立美中的友好關係，中國成為美國在東南亞可信任的伙伴。美國國家利益高於自由市場，在往後 90 年代的新

自由主義浪潮中表露無疑。

而 90 年代蘇聯的瓦解，也讓帝業走入新階段。首先是北約的擴張。波士尼亞戰爭象徵「聯合國安理會首次將軍事行動外包給北約，空中閃電戰第一次被宣稱為人道主義干預行動」。這意味著，本是防禦性的軍事同盟，現在被明白無誤用來進攻另一個國家。另一方面是新的軍事變革。靠著進步電子技術的精準打擊與高空轟炸，美國幾乎已經可以進行一場無傷亡的戰爭。最後則是透過制裁伊拉克，所發展出來的「未經宣佈的常規性戰爭」。

帝業這些新的干預手段與樣態，都在歐巴馬任內，達到高峰。歐巴馬任內，執行「自由特別任務」的「獵補者」無人機成為最理想的的武器，反恐戰爭被更名為「海外緊急行動」，酷刑很大程度上被刺殺取代，CIA 從獄卒成了殺手組織。另外，歐巴馬也在未經國會授權下向利比亞發射導彈，並聲稱美國部隊並未參與其中，這並不是戰爭行為，而是「動態軍事行動」，向伊朗投射「震網」病毒更是公然違反了國際法。「從詹森擔任總統至今四十多年，從來沒有哪位美國總統如此密切地參與對外國基礎設施發動的，逐步升級的攻擊」。

鑒乎過去，是否可以預測未來？在美國帝業的長期擘畫中，戰略重心向西太平洋轉移，是 90 年代以來的重大轉折，其當前後果是，關注中東與亞洲的歐巴馬，無力敏銳回應歐亞大陸的變局。一方面是俄羅斯的復興，另一方面是過去堅定的歐洲同盟戰友，此時自身的國家利益考量，更甚於帝業的全球布局。川普如何應對這樣的變局？又會激盪出怎樣的謀士思想論辯火花？這都是關心世界政治格局的有識者，需要密切關注的。也是安德森這本新作，永遠未完待續的一章。

10.6570/PSQBR.2017.54.4

Badiou and Politics

Bruno Bosteels

許子文 /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當前或許正是一個重新審視基進政治哲學的時刻。在美洲，由佔領運動引發的火苗持續抵抗著濫用權力的警治暴力；在歐洲，反撙節運動挑戰了民主政府的正當性。整個世界彷彿進入一個新紀元，過去那些根深蒂固，看似無法挑戰的權威，在素樸的「抵抗」怒火面前，顯得無能為力。伴隨動盪不安的時局，學術界對於「批判理論」的需求也正在成長，其中，Bruno Bosteels 這本《巴迪歐與政治》（*Badiou and Politics*）的主角，法國毛派不懈的旗手巴迪歐（Alian Badiou），更是炙手可熱。

書名：Badiou and Politics
作者：Bruno Bosteels
出版者：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年份：2011
頁數：464 pages
ISBN：978-0822350767

巴迪歐的一生，可說是如何接合「基進哲學」與政治行動的典範，長期投身法國運動的他，同時也是一系列大部頭哲學著作的作者，既是基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忠誠於柏拉圖式理型或真理的哲學家，據說，真理會在蒙昧、無法預知的情境或「世界」中浮現的「事件」顯現出來。

巴迪歐流利地在高度思辨性的哲學，與簡潔又尖銳的現實論戰中來去自如，數學體系而哲學化的本體論「雜多」（multiplicity），與戰鬥性政治行動之間的張力關係，是巴迪歐思想的迷人之處。「無客體的現象學」是巴迪歐對於表象世界的哲學性表述，從而抵抗了現代性主體哲學的誘惑，要理解這個表象世界，數學化的範疇論是個更上手的工具。

Bosteels 特別將巴迪歐的政治哲學歸功於他在 60 年代圍繞著結構與邏輯的討論，儘管 Bosteels 淡化了巴迪歐流利上手的數學工具，但就像 Bosteels 所強調：一切的邏輯與本體操作，即便表面上看起來如此形式化，終究存在經驗性的核心。對 Bosteels 而言，這些「經驗性核心」，活生生的抵抗時刻，更凌駕於於形式化的推敲。

儘管淡化了巴迪歐惱人的數學公式，Bosteels 細緻梳理了巴迪歐「政治」中的哲學，與哲學的政治，對於法國思想來說，巴迪歐並不是第一個抵抗理論與實踐二分的哲學家，Bosteels 地指出了巴迪歐對於阿圖塞思想的繼受：阿圖塞對於意識形態與科學的區分，影響了巴迪歐對於真理與知識的區分；阿圖塞的結構性因果與多重決定論啟發了巴迪歐的事件理論。

Bosteels 對於巴迪歐早期政治「哲學」的關注，頗具新意。一方面，由巴迪歐對於阿圖塞的「翻案」，表明了當前的世界，需要的是對於一切結構性論述的政治超克，「新的」事件，一如巴迪歐反覆強調，會在結構無法預期的關頭浮現。結構性變化的重點往往不在於發生了什麼，不在於我們能從現實中知道些什麼，而是在這個處境，「新」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存在與事件從來都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從存在本身的僵局中結合起來。

我們不妨以此重新審視巴迪歐最為人詬病的政治立場：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巴迪歐從來都不否認文化大革命是個面對黨國結構，深陷僵局的政治運動，儘管如此，文化大革命依然見證了把政治從黨國架構中解放出來，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尋找工人抗爭新形式的政治意志，即便它最終失敗了。

另一方面，這也表明，巴迪歐往後向本體論議題的轉向，乃出自於其早期對於知識論議題的關注。Bosteels 最別具意致，並與許多巴迪歐的詮釋者，乃至於巴迪歐本人相悖離的見解是，巴迪歐「毛派」色彩最重的《主體的理論》，是理解巴迪歐思想最關鍵的作品。

對 Bosteels 來說，巴迪歐之後的作品，無論是《存在與事件》或者《世界的邏輯》，都需要「主體的理論」來具體化某種「例外」的事件，好讓巴迪歐的「唯物性辯證」，可以與被巴迪歐戲稱為「民主唯物論」的東西區分開來。對 Badiou 來說，一種真正解放性的政治，必須超越權力的問題脈絡，超越國家的政治視野，與之切割，構思在這些虛構的政治之外會出現的東西，如果打從一開始就沿用舊的框架，用對權力的形式來思考政治，那麼無論如何都只會以失敗作終。

巴迪歐的「元政治」（metapolitics）抵抗一切的代議政治形式，也必須留意「政治」並不是與諸如資本主義等「經濟基礎」對立的範疇，Bosteels 論稱，巴迪歐式「辯證」的深意在於，它讓我們從空無與過剩的角度來構思政治，而不是整體化或否定。

政治的內涵總是超越於世界的實證秩序，說政治是公理化（axiomatic）意味著它肯定了某種無法從特定世界實證秩序中衍生出來，而特定的「世界」也不承認其存在。因此，從內於世界的觀點來看，政治所肯定的公理乃基於無物，從本體論的角度來說，確切地說他們乃基於世界的空無。

表象的世界不只是物體與語言，不只是忠誠於解放性事件的集合體，還需要一個先於事件，危殆不安的主

體。在《世界的邏輯》中，可以看到巴迪歐在《主體的理論》中的主體性模式，特別是面對事件性轉折的勇氣與焦慮。政治（藝術、科學與愛情）獨有的真理過程，這都無法單純歸結為哲學分析，正如 Bosteels 所強調，主體是「為了一個可能的普遍真理，持續探問一個事件後果的碎片化」。主體，確切來說既非結果也非起源，而是一個過程中的局部性狀態，逸離當下情境的某種形構。

Bosteels 對於巴迪歐「政治」面向的關注，固然相當程度回應了其「過度哲學」的批評，不過，儘管巴迪歐的政治思想容或不是反歷史的，武斷的左膠哲學，但在嚴謹的數學本體論，與「打造一個共同前鋒的集體擘畫」之間如何調和？依舊看似個大問題。

而巴迪歐並不這麼認為，他高度思辨性極強的政治思想不是我們慣稱的「政治哲學」，對巴迪歐來說，正是學院裡無法正面面對思想與真理的「政治學」與「政治哲學」，阻礙了我們對於「政治」的思考，一個稱的上「政治」之名的政治，首先是個深刻的觀念論表述：古希臘的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追問了人的本質與城邦之間的關係，追問了人作為政治動物與善之間的關係，當前學院裡僅僅止於描述公眾意見，樂於抽象推理的「政治學」，連政治學的邊都搆不到。

堅持與「世界」決裂的「政治」，表面上看來與亟待理論資源撐腰的政治行動（及其「哲學」）格格不入，但這樣的說法正好做實巴迪歐對政治（哲）學的指控：假定了思想與行動的二分。巴迪歐說，「無疑有『做』政治這樣的東西，但它旋即就是一個思想純粹而簡單的經驗，它就是政治的在地化，做政治無法與思考政治區分開來」。

與世界決裂需要思想，而這樣的思想就是政治，而政治終究又要回到世界。巴迪歐精細的哲學論述，是對作為「不可能技藝」政治的推敲。那麼，巴迪歐念茲在茲的「共產主義」是什麼？它是政治這種「不可能的技藝」所組織起來的平等，這樣的政治技藝不懈地追求對所有人都普遍的真理。

10.6570/PSQBR.2017.54.5

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David V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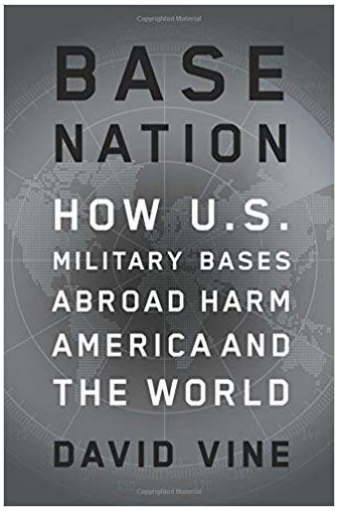
黎野平 / 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如果有一個界定當前世界秩序格局的時間點或事件，對《基地帝國：美軍海外基地如何影響自身與世界》的作者──人類學家范恩（David Vine）來說──那會是 1940 年的九月二號，在距離美國正式向軸心國宣戰一年多前的這天，羅斯福總統照會國會，他已經核准與英國的一項協定：美國將以提供盟國五十艘驅逐艦的代價，換來對於英國設在殖民地海空軍基地的實質控制。

這是在人類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全新世界治理形式「基地帝國」的第一步。羅斯福的想法是，海外基地可以強化長程戰鬥機的戰力，這樣的思維並不前衛，早在馬漢少將的「海權論」論述中，就已經強調建立支援基地網絡的重要，只是來到 20 世紀，主角換成了制空戰力。因此，毫不意外在珍珠港遇襲美國正式宣戰後，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報告宣稱，「美國擁有或控制足夠的基地，是最根本的」，於是「取得與開發基地必須是首要作戰目標之一」。

二戰結束後，美國並沒有將戰時的基地全數撤離，一方面是與赤色蘇聯的冷戰接踵而來，另一方面，也是戰略思想的轉變：維持國際秩序再也不能依賴歐洲經驗所探索出來，透過列強周旋的「權力平衡」，事實上，新的冷戰格局也無法容許。

羅斯福在 1939 年說過，「沒有一項攻擊可以當作不可能，不會發生，而予以輕忽」，這話對後 911 的美國來說異常諷刺。面對這個永遠充斥危險的世界，最好的辦法就是「前進戰略」，承平時期就主動進行攻勢部署，好隨時動員戰鬥能量來應對一切意外的攻擊。



書名：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作者：David Armitage
出版者：Metropolitan Books;
年份：2015
頁數：432 pages
ISBN：978-1627791694

「前進戰略」為冷戰時期的「圍堵」提供了條件。中東曾經是地球少數沒有冷戰競爭蹤跡的地區，也因為 79 年伊朗革命與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美國的戰略轉向，不再透過區域強國介入，轉而直接透過設立軍事基地。這個卡特總統任內被稱之為「卡特主義」的戰略轉向，對整個世界治理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羅斯福用驅逐艦交換基地的決策。

不過，蘇聯的瓦解並沒有讓海外基地走入歷史，冷戰的結束並沒有讓美國放棄對海外的支配，基地反而從歐亞大陸延伸散佈開來，911 事件之後，小布希政府更是強化了在非洲的基地部署。

對美國的戰略決策者來說，美國的「國家安全」，早就不再與領土綁定，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小布希或歐巴馬，都沒有懷疑海外基地對於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

海外基地的存在，是否真的強化了國家安全？因為無法驗證，所以答案幾乎無解。海外基地的部署也許「嚇阻」了敵對國家，但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挑釁，反而激化了軍備競賽，讓區域秩序變得更不穩定。另外，某種意義上，海外基地也是充滿惰性的制度遺緒：例如陸戰隊唯恐失去其在軍中的地位，因此極力訴求保留海外基地。

無論如何，海外基地的擴張宣告了新的世界治理形式：跟 19 世紀的殖民帝國不一樣，新的基地帝國再也不需要佔領遼闊的土地，領土的佔領乃至於主權的歸屬都是舊時代的議題，新時代的世界有完全不一樣的治理方式。

美國不是蘇聯，作為「自由民主陣營」的大國，思想上，它不能公然背棄民族國家的獨立理念。儘管美國依然樂於與非民主國家獨裁者合作建立基地，一方面，美國可以取得區域的影響力，而對獨裁者來說，通過與基地的合作，也可以維持鎮壓異己的武裝能量。但是，在冷戰結束後，一座「小美國城」的大型基地突兀在他國領土，終究格格不入。

基地的轉型勢在必行。小布希任內開啟了對於「小美國城」的改造，不再熱衷於建立大型的海外基地，而是專注開發更小且更靈活的基地，包括中型的「前進作業點」以及小型的「蓮葉」（Lily Pad）基地：靈感來自於青蛙藉著蓮葉當跳板穿越池塘。

拜軍事科技的進步所賜，空運與海運技術的進步，從國內基地直接調遣部隊，速度並不會比從海外基地調遣部隊來得慢，因此，面對質疑海外設置基地的質疑聲浪，美國軍方開始強調在海外維持屯藏武器與補給，也就是「裝置預備」的重要，另一方面也省下維持「小美國」基地，支援部隊與眷屬的大筆經費。

這樣的作法除了避免與在地宗主國的無謂摩擦外，也具有政治修辭的優勢：美國官方可以聲稱其實沒有這麼多的海外基地，「只有進出使用，不是基地」（Access, not bases）。但「不

會有國旗，不會有駐軍，不會有眷屬」蓮葉基地的廣泛建立，並不代表基地帝國的消退，反而象徵迴避公眾目光，更為細緻的部署深入。

蓮葉基地的存在不僅僅只有軍事意義，它也扮演了深化美國與宗主國關係的角色。建立蓮葉基地的交涉必然涉及雙方的接觸與談判，除了自身的軍事目的外，蓮葉基地也協助宗主國從事準軍事行動（緝毒、反恐與維安等等），其結果是外國的軍事領袖與部隊，越來越融入美國的軍事結構，透過出售高階裝備與武器，與安排軍事訓練等等，更是直接將「友軍」納入美軍的體系中。

基地的存在往往涉及美國軍方、宗主國方與在地社群近乎醜聞般的交易，而在地社群的人民，往往是被裹脅乃至於污名化的一方（例如，「向日本人無度勒索的沖繩」），沒有殖民關係卻依然無以發聲的底層一方。范恩細緻的人類學筆法深刻描繪了基地的民族誌：海內外錯綜複雜的金錢交易網絡與基地生活的五光十色等等，自然也免不了基地與在地居民的紛爭衝突：特別是發生在營區內外的性侵糾紛。但范恩主張廢除基地所省下的經費，可以拿來挹注美國國內社會福利與教育的立論，著實不免政治幼稚。

德國公法學家施密特曾經敏銳地指出，用以界定國際秩序的和平與戰爭的大地之法（nomos of the earth），必然建立在對例外狀態的切割與排除之上。在過去的歐洲大陸，歐洲公法所建構的國際和平秩序，其基礎是對於歐洲與非歐洲、新世界與舊世界、文明與非文明的區分，「友誼線」（amity lines; Freundschaftslinien）為歐洲公法的效力畫出界線，界線之內是文明化的空間，界線之外的例外狀態是允許投射絕對敵意，進行無限戰爭的「無法空間」。

在這個聲稱以民族國家主權為主要構成單元的世界秩序，基地的存在是近乎常態化的例外，作為新的大地之法，「基地帝國」不再需要明確切割出勢力範圍的友誼線，其動力也不是法內與法外空間的抗衡與辯證，「只有進出使用，不是基地」的政治修辭優勢所反映的是秩序與例外的新關係，新的例外狀態流動並隱蔽起來，遁入一個個小小的蓮葉基地中，他們正是這個被稱為「一超多極」國際秩序格局之下的塊莖。

10.6570/PSQBR.2017.54.6

The China Boom

孔誥烽（Ho-fung Hung）

謝陶陽 /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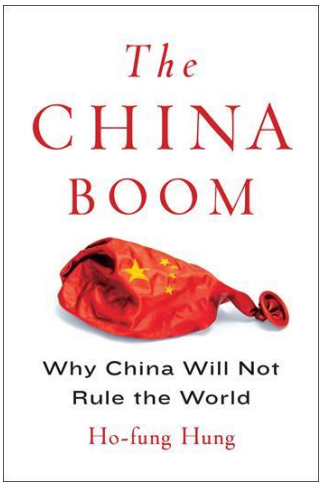
「中國熱」（The China boom）是個頗具爭議的概念與現象，它在相當程度上指涉對於中國目前發展現狀不切實際的期待，孔誥烽（Ho-fung Hung）這本題為「中國熱」的新書，有一個頗有意思的副標題：中國將無法統治世界。

如他所說，這本書他希望探討四個中國熱主題：第一，中國是否挑戰了當前全球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第二，中國改革開放提高龐大人口收入的經驗，是否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學習典範？第三，中國是否挑戰了美國的霸權地位？第四，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困局中，中國是否能擔當拯救全球經濟的角色？

孔誥烽把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放在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的興起這個長程歷史脈絡下。在 17 與 18 世紀之際，中國曾經因為大量湧入的美洲白銀，而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市場經濟。但蓬勃的市場經濟，卻沒有辦法將農業剩餘，轉化為資本，投入生產性產業，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創造條件。這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中國運用國家體制收編了潛在的資本家，也就是商人。

商人階層傾向於將自己轉變為士紳與國家菁英，而不是持續累積財富，這就限制了商業菁英的規模與其權力。這與 18 世紀的英國，以及 19 世紀的日本，構成鮮明的對比，在這兩個個案中，企業的經營都基於「以企業為基礎的經濟」這個理念，但大清中國商業經濟的特點確是「強網絡，弱企業」。

不存在強而有力，以累積資本為目標的資產階級，是中國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的主因。這與中國的「家父長」統治也有關係，在商人階級與底層人民之間，大清中國的掌權者經常是以犧牲前者，來平撫人



書名：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作者：Ho-fung Hung
出版者：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年份：2015
頁數：264 pages
ISBN：978-0231164184

民的騷動，清政府更般不了剛性的財政措施，以永不加稅的方式，來防止大規模的社會動亂，這也使得清政府不像早期現代化的歐洲各國，因為公共開支的增加，而依賴商人階級購買公債來支應。

不過，由於土地稅收是大清帝國的主要收入，永不加稅限制了政府開支的增長，一旦通膨壓力回升，國家的治理能力就會迅速削弱，導致大清帝國晚年對農民起義的應對無力，整個 19 與 20 世紀，中國的重大政治問題都在於重建能有力汲取資源的中央政府。

到了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後，中國才以「蘇聯模式」，將農村集體化來取得農業剩餘，並將之再分配用於工業化，到了 70 年代末期，中國已經具有初步的基礎設施網絡，以及往後在經濟成長扮演重要角色的國有化產業部門。鄧小平所開啟的改革開放，可以分成兩個階段，80 年代的重點是恢復市場經濟，並創造農業部門的增長，90 年代的重點則是國有企業的改革。比重甚大，且具有龐大固定資產投資的國有企業部門，高度依賴出口部門的貨幣流動與外匯儲備，出口導向且勞力密集的產業取向，維持了國有企業的倖存，但這很大一部分是拜 80 年代以來全球自由貿易的興起。

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相當程度是依附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之下，說中國的經濟模式，挑戰了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與全球市場，完全忽略了中國以國有企業為主的特殊結構，一旦出口部門的成長來到極限，這個結構的弊病將會爆發。

就中國的經濟成長能否有效降低全球經濟不平等這點來說，儘管中國重新整合進全球經濟體系，短期內有效地降低了全球貧困，不過，一旦中國人均收入水平高於世界平均，這個趨勢就會減弱，而降低全球貧困的任務，就端賴其他發展中國能否跟著中國腳步實現快速的經濟成長。

但是，由於中國經濟成長主要依靠出口部門，其出口導向型態的製造業，無疑正給其他依賴勞力密集出口製造業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壓力，孔誥烽質疑了中國擔當世界經濟平衡者角色這樣的說法。

另一個中國熱議題是：中國的崛起是否挑戰了美國的霸權。就這點來說，中國確實是第一個在美國軍事保護傘之外崛起，而具有地緣政治強勢地位的強權，這點與德國及日本不同。但是中國出口導向為主的經濟型態，卻導致大量美元流入中國銀行，除非中國成功實現經濟轉型，減少對出口部門的依賴，否則中國恐怕無法實現真正的經濟與地緣政治自主。

最後，就中國在全球經濟危機困局中的腳色來說，孔誥烽所著眼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結構，它的特色是威權治理的分權結構，以及農村的財政緊縮，這造成了過度投資與消費不足的後果，中國透過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擴大投資與促進出口，來刺激中國經濟的反彈，但這也同時加劇了中國內部的失衡與債務，這樣的飲鴆止

渴，將會在未來幾年嚴重抑制經濟增長。

孔誥烽認為，當前中國對經濟再平衡的需求，比任何時候都迫切，但這不太能繼續依賴出口部門，而必須著眼於國內消費的比重提升，但這無避免涉及對收入與資本僵固的再分配，這當中包括縮減國有部門的特權比例，在沒有相應政治體制的改革配合下，是無法動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結論是，中國並沒有改變既有全球經濟政治秩序的能力，因為中國自己就是最大受益者，維繫中國經濟命脈的出口部門，同時也是讓美國持續保持其霸權主導地位的因素。

中國的崛起無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但「中國熱」卻相當程度上是不理性的期待與情感投射，理性與智識是破解中國熱迷思的不二法門，孔誥烽這本兼具歷史與社會科學深度的著作，無疑值得細讀。

10.6570/PSQBR.2017.54.7

Janus's Gaze: Essays on Carl Schmitt
Carlo Gal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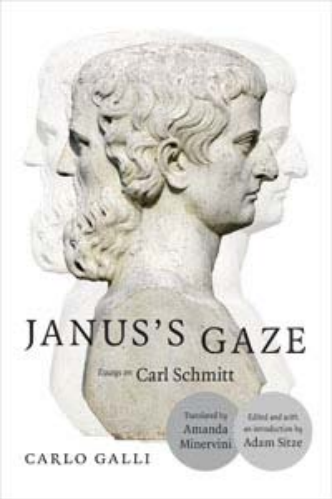
魏柏高 / 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雅努斯的凝視》(*Janu's Gaze: Essays on Carl Schmitt*)是知名義大利學者 Carlo Galli 詮釋施密特論文的集結，原文於 2008 年出版，與當前施密特復興的文獻相比，它更著重於施密特思想的方法論面向，以及其智識史意義。

這本論文集子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部分，前兩個章節闡述了施密特思想的系譜，Galli 全面地考察了施密特（主要是）戰前的寫作。第一章的主題是施密特式的國家，施密特認為，現代國家本身蘊含了一種「原初的不平衡」(originary disequilibrium)，Galli 指出，施密特認為要重新平衡這個困境，就必須要認知到秩序根本的空無（void），自由主義對此一政治張力的抹消，注定徒勞無功，Galli 強調，施密特的洞見是，抹除一切衝突的自由主義式現代政治，終將土崩瓦解，但政治，卻不會這樣就消失。

第二章處理的是例外與超越性的問題，Galli 將施密特的政治概念定位在一個無法化約的張力：政治是一個在秩序的空無之上建基秩序的問題。第三章與第四章則相對簡短，第三章分析施密特與施密特對於史賓諾莎的不同態度，這兩位當代思想家對史賓諾莎的不同評價，反映了他們對政治的不同構思。在第四章中，Galli 則討論了在施密特學界中少被檢視的主題：施密特對於馬基維利的評價。他認為，馬基維利從力量或德行角度，來看待國家緣起的立場，使得施密特將他歸入自由主義式國家觀的政治系譜，但這並非施密特自己所主張的立場：政治的原初是敵友關係，而非力量或德行。

第五章與第六章則構成全書的第三部分，主要處理的是施密特戰後對於國際關係與秩序的文獻。Galli 闡述這些戰後文獻的關鍵概念是施密特畢生著



書名：Janus's Gaze: Essays on Carl Schmitt
作者：Carlo Galli
出版者：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年份：2015
頁數：232 pages
ISBN：978-0822360322

力，「在建構與維持秩序時扮演必要角色」的政治對立。對 Galli 來說，施密特政治的概念，是對於政治在存在意義上無序的回應，他並且認為，施密特的政治概念，無法繼續在當前的全球化時代，成功扮演施密特所期待的角色。

施密特的政治概念將衝突視為秩序的內在要素，在秩序的創建中，敵人總是扮演一個無法抹去的角色，這個在理論層次上的對抗性（antagonism）要素，存在於施密特對浪漫主義的批判、對「政治性」（the political）理論的陳述、世俗化政治神學的決斷理論。所謂的「施密特主義」者，不管政治光譜左與右，某種程度上都接受了這個非規範性，在理論層次上，嚴峻的本體論「現實」：「政治性」（the political）與「政治」（politics）的區分，用 Chantal Mouffe 的說法來說，前者「構成人類社會中對抗的面向」；後者是「在政治性所提供的衝突脈絡中，一個秩序得以建立並組織人類共存的一套實踐與制度」。

但是，當前全球性的衝突，更接近於沒有常規可循的絕對戰爭。因此，回到第一部分的主題，全球性的衝突無法建構出某種秩序所必要的例外狀態，曾經得以平衡秩序的原初不平衡，在全球脈絡下會變成純粹的無序。歐洲公法體系的瓦解，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因為例外狀態消失了。其外在因素諸如日本作為強權進入世界舞台，歐洲在新大陸殖民的終結，以及伴隨門羅主義出現的西方強權團體，工業化的擴張與深化，以及深海與太空探測的科技變化，在思想的對應上，「文明」範疇受到質疑，在歐洲公法中，歐洲與非歐洲的區分主要是文明的區分，這個區分一旦受到挑戰，歐洲母國與殖民土地之間的區分就同時也模糊了，施密特把這個區分的模糊歸因於自由憲政與市場的思想潮流：

凌駕、潛伏與相伴於國家政治邊界的，似乎是一種純粹的政治國際法則，在國家之間散佈一種自由，也就是瀰漫到一切，經濟的非國家化場域：一種全球經濟。在自由全球經濟理念中所提出的不只是超克國家政治邊界，也是作為一種基本的前提條件，這個國際法則中個別成員國內在組織的標準，它預設每個成員國都得要建立一個最低限度的憲政秩序，這個最低限度標準包含了私領域豁免於於公領域的自由，以及兩者的分離 。

其結果是，一旦殖民地不再是歐洲之外的例外空間，而變成全球經濟市場的參與者，「變得等量齊觀時，傳統的，特別是歐洲的國際法也就行將終結」。而門羅主義，更是瓦解歐洲公法的最後一擊。門羅主義「起先用來保證美洲大陸不被歐洲強權干預的門羅主義，跟著讓美洲所有國家都屈服於美國的霸權，從而證成了美國在美洲的干預、控制與國際警察角色」。它用西半球界線、經濟干預、道德化的歧視性戰爭等等，徹底瓦解了歐洲公法體系。門羅主義的大空間是「最為現代的」帝國主義，其特色在於玩弄經濟與政治的對立的把戲，以一種細膩的「政治」方式，宣稱經濟與商業是「去政治化的」

Galli 對於施密特的詮釋，建立在某些方法論與智識史的預設。全書的主題總結地說，可以看做是一個思想家如何回應其歷史處境。這某種程度上暗示，由於施密特立身的時代，與我們當前的全球化時代，已經有了本質上的不同，因此，施密特所看到的問題，無論是內在於秩序的衝突、原初的不平衡、大地與海洋的對立，乃至於常態與例外的對立，都失去施密特曾經抱以重望的思想力量，而施密特本人戰後時期的書寫，也透露出這種氣味：絕對的戰爭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常態。政治在某種意義上是藉由例外切割出秩序的空間論述，但在當前這種空間無所區別，或者例外成為常態的全球政治中，政治自然也就耗盡了其潛能。Galli 別具深意的詮釋，固然對當前繼受施密特論述範疇的思想，提出了質疑，但值得深究的另一個問題是：施密特所診斷的現代，與當前的全球化時代，是否真的有本質上的不同？

Galli 在書中反覆指出，必須區隔施密特的「理論」，與施密特的「意識形態」。在某些主題上，這樣的區隔是相對容易的，例如，自由主義中的個人主義地基，無法撐架起現代國家，這個論斷可以與施密特自己的反猶論調，以及對史賓諾莎的抨擊區隔開來。但在某些主題中，這樣的區隔是相對困難的，比如說，大地與海洋的關係，以及歐洲公法的崩潰，施密特對這些主題的探究，很難與他自己對於美式帝國主義以及門羅主義的反感區隔開來。

在 Galli 這本書中，施密特於當代政治理論中的地位，具有相當比重，但可惜的是，礙於篇幅所限，Galli 並沒有全面地發展其論述。最關鍵的問題，施密特對全球戰爭的論述，更是被嚴重壓縮。有幾個關鍵論題是 Galli 的詮釋所無法迴避的：第一，如何界定全球時代？其與施密特立身的現代，差別何在？第二，為什麼全球時代會讓施密特所構思出來的政治概念，失去效力？第三，戰爭型態的改變，全球戰爭的出現，如何讓人們必須放棄施密特的政治概念？這些也都是當前重新檢視施密特思想遺產時，無法迴避的問題。

【政治科學季評長期徵稿啟示】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華文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一) 短篇書評：針對人文社會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二) 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截稿日期：長期徵稿

■ 稿件筆潤：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 注意事項

(一)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二)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三)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四)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一) 將稿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PoliSciReview@nt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